

#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

王志浩 侯亚梅 杨泽蒙 甄自明 刘扬  
包蕾 杨俊刚 白林云 张立民

**关键词：**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乌兰木伦遗址 旧石器时代中期

**KEYWORDS:** Inner Mongolia Ordos City Ulan Moron Site Middle Paleolithic Age

**ABSTRACT:** The Ulan Moron Site located in Ordos City, Inner Mongolia consists of Loc. 1, Loc. 2 and Loc. 3. In Loc. 1, totally 2780 stone artifacts and 3423 mammalian fossils were obtained together with fire-use remains by a rescue excavation in 2010 and a formal excavation in 2011. Dating result for Loc. 1 from  $^{14}\text{C}$  and OSL methods is 70 – 30 ka BP, meaning that this site belongs to middle Paleolithic Age. A primary study shows that the site was deposited *in situ*.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hic assemblage are quite similar to the middle Paleolithic cultures in Europe. The mammalian fauna are the part of Sjara-osso fauna of the late Pleistocene Epoch in North China. Large amounts of bone artifacts and fragmentary bones including those with obvious cutting marks indicates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uman behavior. In a trench of Loc. 2 one trace of rhinoceros footprint was discovered in addition to some stone artifacts and fossils. The Ulan Moron Site is an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iddle Paleolithic Age in China. All these evidences provide good materials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an behavioral adaptation and modern human origin.

## 一、遗址概况

乌兰木伦遗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康巴什 2 号桥以东约 300 米, 地处康巴什新区景观河岸。乌兰木伦河属黄河干流水系, 是一条季节性河流, 源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柴登乡巴定沟畔, 自西北向东南

流经鄂尔多斯市进入陕西神木县境内。遗址即发现于该河左岸充填第四纪堆积物的古河道支流中。遗址由第 1、第 2 和第 3 地点共同构成一个地点群, 其中第 1 地点位于最东边, 地理坐标为北纬  $39^{\circ}35.152'$ , 东经  $109^{\circ}45.659'$ , 海拔 1281 米; 第 2 地点位于第 1 地点西侧约 50 米处; 第 3 地点位于第 1

作者: 王志浩,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010098, 鄂尔多斯市青铜器博物馆。

侯亚梅、刘扬、张立民, 北京市, 100044,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

杨泽蒙、甄自明、包蕾、杨俊刚,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017000, 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白林云,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017000, 鄂尔多斯博物馆。



图一 乌兰木伦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地点西侧约 160 米处(图一;图版壹,1)。从目前已进行了一定工作的第 1 地点和第 2 地点来看,遗址内涵十分丰富。

### (一) 地理及地质概况

乌兰木伦遗址第 1 地点宽约 15 米,底部基岩面距地表高约 15 米,文化遗物发现在基岩以上厚约 5~8 米的地层中。初步观察,遗址地层的形成经过了河流下切底部基岩并形成小峡谷和结束下切后开始接受河湖相堆积两个阶段。旧石器时代人类从后一阶段开始在此活动。古代先民在此打制和使用过的石器和生活垃圾(如动物碎骨、用火遗迹等)被随后的坡积物、洪积物和河湖相沉积物所埋藏,偶然出露而被发现,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的珍贵材料。

遗址所在的鄂尔多斯高原位于华北大地裂谷系统范围内<sup>[1]</sup>。新生代中晚期,随着构造运动的重新活跃,鄂尔多斯以北的地幔物质上涌和玄武岩喷发,地壳下陷形成了东西向河套裂谷盆地。受其影响,鄂尔多斯地区发生多次间歇性升降活动,新生代早期的准平原面被侵蚀切割,地貌变得复杂。中更新世末期开始,新构造活动使鄂尔多斯地区出现众多的宽谷与湖泊<sup>[2]</sup>。此时全球气候向干冷方向发展,鄂尔多斯长期处于温带草甸草原或荒漠草原环境<sup>[3]</sup>。在夏季风活跃时期,高原上河湖遍布,植被茂盛,食草动物拥有自己的“天堂”,古人类也在这里找到既可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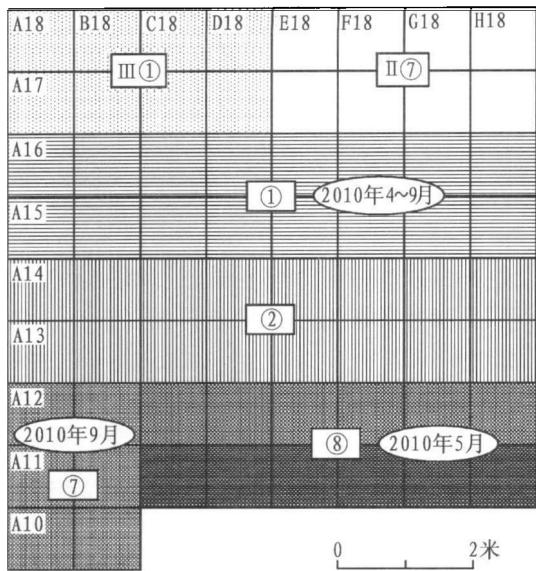
猎又有水源供给的适宜环境。

在乌兰木伦遗址东南方向约 5 公里的东红海子和 7 公里的西红海子是本区域的低洼地,海拔 1285 米。它们是晚更新世古湖的残余,现今仍可观察到岸边地区数米厚的湖相堆积。另外,两个海子以南至少发育两级台地,其上堆积了中更新世以来的黄土堆积,为重建本区域的古环境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 (二) 发现与发掘经过

遗址首先于 2010 年 5 月被发现。当时在乌兰木伦河谷景观河道建设工地的一个泉眼处出土了几件动物骨骼化石,接到报告后,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至现场考察,发现石制品后将其确认为一处古人类文化遗存,即乌兰木伦遗址第 1 地点。2010 年 6~7 月,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对第 1 地点进行抢救性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并发现用火遗迹。2010 年 9 月,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该地点又进行了一次试掘,再次获得了大量的古人类文化遗物。在对第 1 地点邻近区域进行的调查中,又发现了第 2 和第 3 地点。鉴于遗址的重要性,考古发掘队于 2011 年初正式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了乌兰木伦遗址发掘执照,并于 2011 年 4~9 月进行了正式发掘。

第 1 地点在 2010 年 6~7 月只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自 2010 年 9 月成立联合考古发掘队以来,发掘工作严格按照具有国际水准的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进行。为使探方北壁与景观河道平行,探方方向为 30 度,规格为 1 米×1 米。以探方西南角为原点,规定横坐标以 A 为起始,往东依次为 B、C、D 等;纵坐标以 10 为起始,往北依次为 11~18 等(图二)。经过抢救性发掘、试掘和正式发掘,遗址第 1 地点的发掘面积累计为 66 平方米。为科学获取遗址信息,在发掘过程



图二 第1地点布方平面图  
(图中Ⅱ⑦为第Ⅱ地层单元的第7层,Ⅲ①为第Ⅲ地层单元的第1层,其余圈码表示探方发掘到的层位)

中,根据代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气候的土质土色来划分地层,并在文化层内严格按照以5厘米为水平层向下逐层清理;对发掘出土的每件标本予以编号、测量三维坐标和照相;对每个单位发掘出土的土样进行筛洗、浮选和实验室挑选样品。

2011年8~9月对第2地点进行了试掘。主要开挖了一条1米宽的探沟(图版壹,3)。采用每发掘0.5米、留宽1米的台阶的发掘方法进行清理,其地层、出土遗物的处理采用与第1地点相同的方法。

### (三)地层与古环境

遗址所在地基岩为白垩系红色风成砂岩,顶部为近现代风成砂堆积,遗物地层呈现灰绿色和红色交错的河湖相三角洲沉积。以第1地点为例,其地层堆积厚约15米,出土遗物的地层堆积厚约5~8米。地层可分8层,遗物出自第2~8层,分布总体较为密集和集中(图三)。

**第1层:**自西向东倾斜。主要为白垩系基岩风化后的红色砂状堆积,内含大块的基岩风化块,厚约1~2.1米。仅发现1件骨化石。

**第2层:**自西向东倾斜。上部为红色砂

质堆积,局部含少量白垩系基岩风化岩块,下部为青灰色粉砂,厚约0.6~1.4米。此层上部出土遗物较少,下部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牙骨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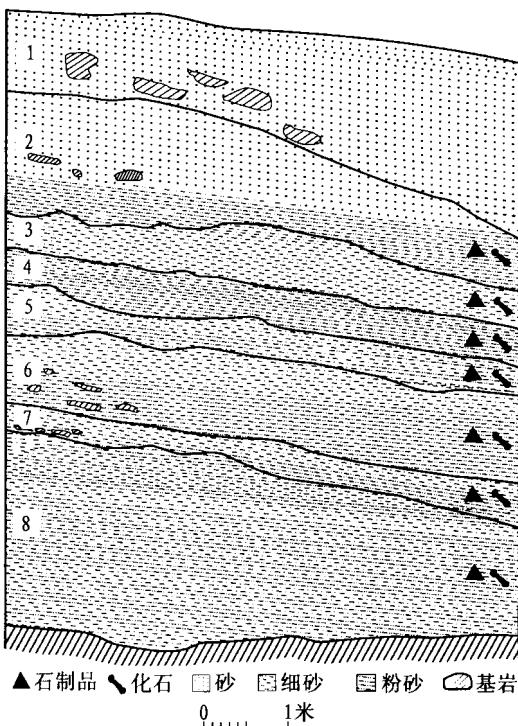
**第3层:**自西向东倾斜。红色夹灰色细砂,厚约0.3~0.8米。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牙骨化石。

**第4层:**自西向东倾斜。以青灰色粉砂为主,局部为红色细砂,厚约0.2~0.6米。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牙骨化石。

**第5层:**自西向东倾斜。青灰色粉砂与红色细砂交错层,厚约0.15~0.4米。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牙骨化石。

**第6层:**自西向东倾斜。上部为红色细砂,夹杂白垩系基岩风化岩块,下部为青灰色粉砂,厚约0.6~0.8米。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骨化石。

**第7层:**自西向东倾斜。青灰色粉砂,顶部偏西为红色细砂,夹杂少量白垩系基岩风



图三 第1地点北壁地层剖面图  
1. 红色砂状堆积 2. 红色砂质堆积、青灰色粉砂 3. 红色夹灰色细砂 4. 青灰色粉砂 5. 青灰色粉砂与红色细砂 6. 红色细砂、青灰色粉砂 7. 青灰色粉砂 8. 红色细砂与青灰色粉砂

化岩块,厚约0.2~0.4米。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骨化石。

第8层:自西向东倾斜。红色细砂与青灰色粉砂交错出现,底部与白垩系基岩相接,厚约1.1~2.1米。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骨化石。

乌兰木伦遗址地质剖面不整合于白垩系风成的紫红色砂岩之上,主要是一套晚更新世后期的堆积。若以沙丘砂或者三角洲相及其上覆的湖沼相构成的沉积旋回计算,整个剖面显示出20多个旋回,说明乌兰木伦遗址及其周围自晚更新世后期末次间冰期以来经历了多次古湖时期。经初步研究,晚更新世后期之初,乌兰木伦河流域处于一个成湖时期,也是该流域所受东亚冬季风影响较小而夏季风盛行的时期。那时,本地区的沙漠环境有向沙尘暴环境转换的趋势。受夏季风带来充沛降雨的影响,当时地表多有径流,故而形成“乌兰木伦湖盆”堆积<sup>[4]</sup>。乌兰木伦湖盆多次得益于夏季风带来的雨泽。虽然期间曾有过几次沉积风沙流的沙漠环境,但当时的自然环境还是以湖泊为主<sup>[5]</sup>。温和湿润的环境为鄂尔多斯早期人类的生息繁衍创造了条件。不过,后期受冬季风影响,环境发生变化,本区域进入极为严寒多风沙流活动的沙质荒漠时期,此后乌兰木伦遗址剖面记录中便未见古人类活动的踪迹。

## 二、遗迹和遗物

遗址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第1地点,已进行了3次小规模的发掘,第2地点试掘了一条宽1米的探沟,第3地点则只进行了初步的地层考察工作。

### (一) 第1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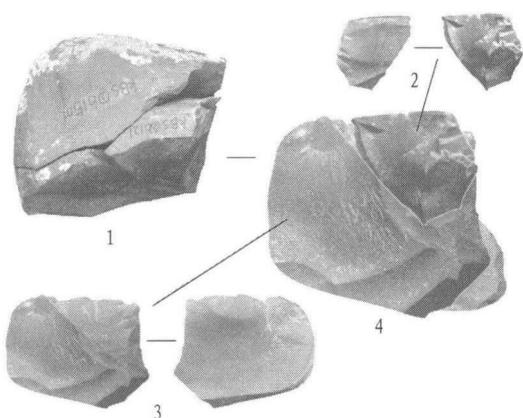
目前,乌兰木伦遗址第1地点的发掘深度并不大,其中有12平方米发掘到第8层,有6平方米发掘到第7层,其余部位仅发掘到第2层或以上层位(图版壹,4)。

#### 1. 石制品 第1地点已发现石制品

2780件,与动物化石一起密集分布(图版壹,2)。石制品原料包括石英岩、石英、燧石、砂岩、片麻岩和硅质岩,以石英岩为主,占90%以上。石英岩分好、中、差三个等级,其中以好和中等为主,反映出古人类对石制品原料的选择性。燧石和硅质岩是打制石制品最为理想的原料,但在乌兰木伦河流域极少见到。而质量相对不错的石英岩砾石在乌兰木伦河流域分布广泛,在河流各阶地上均可见到,砾石层最厚处可达10余米。经调查,离乌兰木伦遗址最近的原料场地不过数百米。各层石制品的原料比例目前观察看来并无太大区别。

石制品按最大长度(L)可划分为微型( $L \leq 20$ 毫米)、小型( $20 < L \leq 50$ 毫米)、中型( $50 < L \leq 100$ 毫米)、大型( $100 < L \leq 200$ 毫米)和巨型( $> 200$ 毫米)五个等级<sup>[6]</sup>。乌兰木伦所出石制品以小型和微型为主,中型也占有一定比例,大型极少,不见巨型石制品。这种现象应与石制品原料本身有关。经初步调查,乌兰木伦河流域阶地上所发现砾石的长度基本集中在10~50毫米之间,原料本身的大小限制了石制品的大小。当然,石制品大小是否与打制技术有一定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目前出土的石制品来看,锤击法是剥片和工具修理的主要方法;而一定数量以小型甚至微型为主的形态稳定、较为规则、明显趋薄型剥片的存在,似乎表明工具修整过程中也可能使用了软锤技术。石制品总体上为小型石片工业组合,未见以卵石或大型材料直接加工的大型工具。另外,在第2层和第6层中还分别发现了一些可以拼合的石制品,其中第2层可拼合的有4组(图四)。在进一步的工作中应该能发现更多的石器拼合案例。这一方面表明该遗址本身的功能之一是生产和制作石制工具,也表明该遗址基本属于原地埋藏。石制品没有风蚀现象,产状上未发现明显的趋同现象和规律;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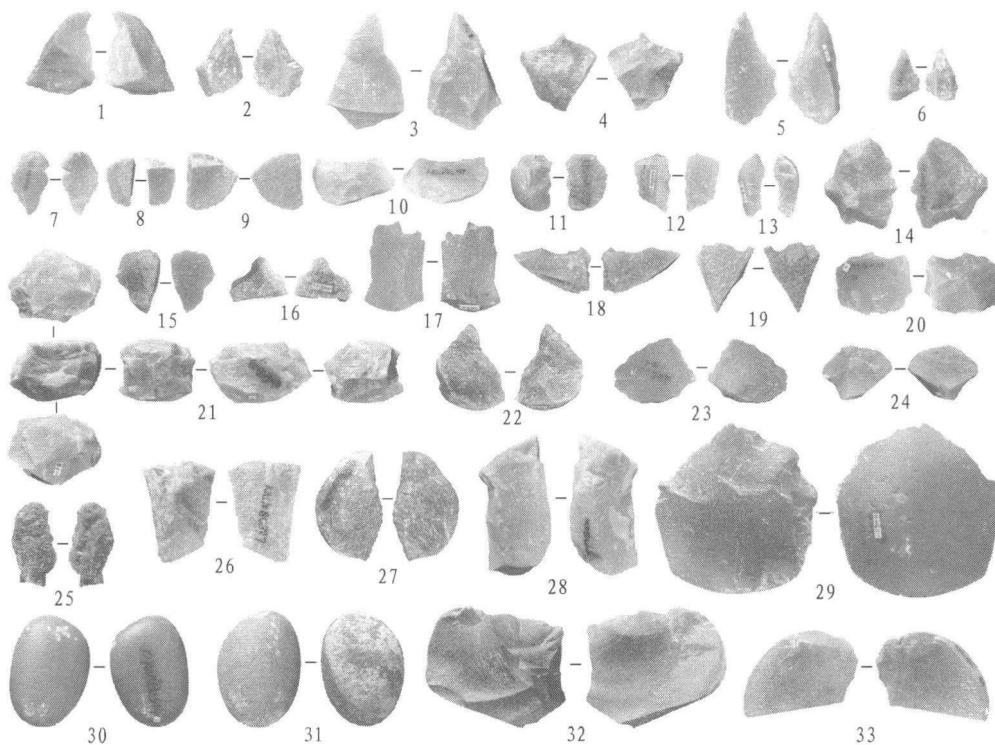


图四 第2层出土的可拼合石制品

1. 石核 (KBS②b150) 2、3. 石片 (KBS②b121、  
KBS②b65) 4. 石核 (KBS②b150)剥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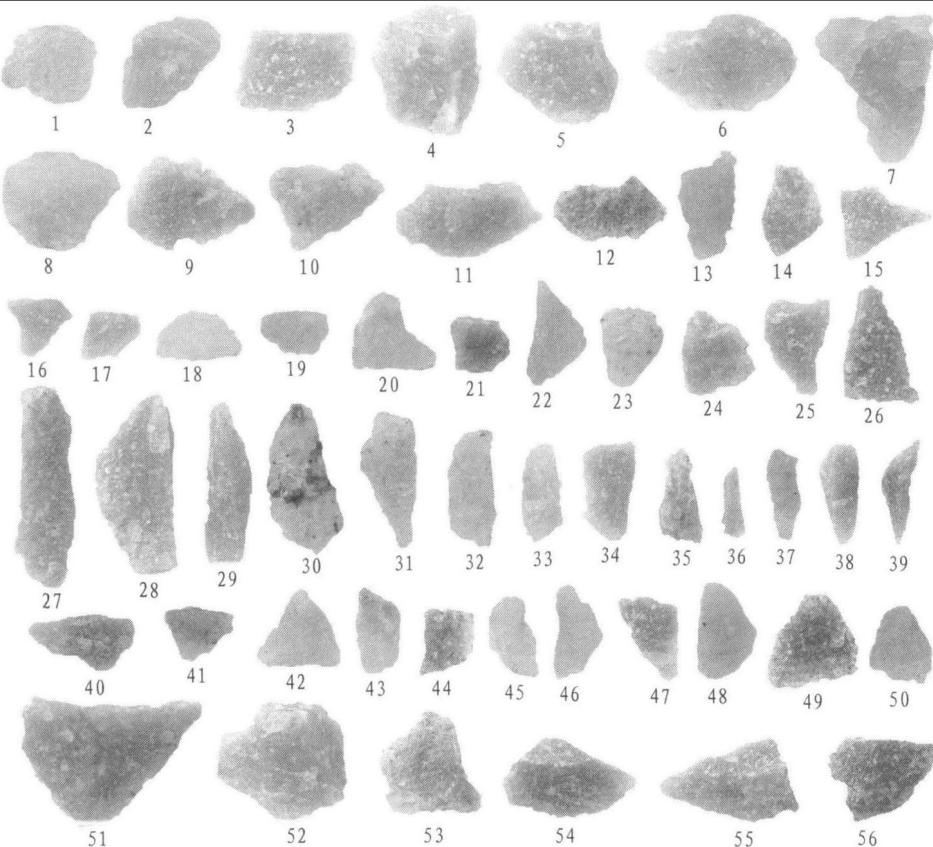
遗址中还发现有用火遗迹、炭屑、烧骨等，以及很多更为细小的石制品残屑。这些都表明遗址为原地埋藏，古人类活动信息保存较为完整。

石制品类型非常丰富，包括石核、石锤、石片、工具、备料和断块等（图五）。其中以石片为主，占64%；其次为工具，占28%；再次为石核，占6%；石锤、备料和断块较少，共占2%。石锤和石核以及大量石片的发现，表明古人类在此活动时具有打片行为；而大量工具的发现，结合遗址所出大量的碎骨，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还有肉食生活行为。石核多为单台面石核，其次是多台面石核，双台面石核最少；台面多为自然台面或人工台面，少见修理台面。石片的各种类型普遍存在，以Ⅲ、V、VI型为主。裂片在石片中占主要部分，特别是左、右裂片最多，其他有近端、中段和远端。这些裂片的存在可能是工具修理的结果。此外，还有数量较多的使用石片。大量碎片的存在也从侧面说明了遗物



图五 出土石制品

1、2. 鸟喙状器 (KBS10-C40、OKW②34-1) 3、4. 锥 (OKW③7-1、KBS10-C39) 5、6. 钺 (OKW⑥N-1、  
KBS10-C22) 7~9. 使用石片 (KBS10②a53、KBS②b200、KBS②b95) 10. 凹刃边刮器 (KBS10②b289) 11~  
14. 锯齿刃器 (KBS10②C375、OKW②44-3、OKW②8-2、KBS10②C342) 15. 端刮器 (OKW②31-5) 16. 鼻头端  
刮器 (OKW②2-1) 17~20. 凹缺器 (OKW②14-1、OKW②51-2、KBS②b158、OKW③15-1) 21. 石核 (OKW④  
53-1) 22. 尖状器 (OKW②25-5) 23. 汇聚型刮削器 (OKW⑦18-1) 24. 斧型小石刀 (OKW④7-2) 25. 原型  
器 (KW11F14②1360) 26. 刀 (KBS10②C397) 27. 犁背刀 (OKW④11-1) 28. 雕刻器 (OKW③44-2) 29. 盘状  
器 (OKW②5-1) 30、31. 锤 (OKW④14-1、OKW④33-1) 32、33. 石片 (OKW②b65、KBS10②a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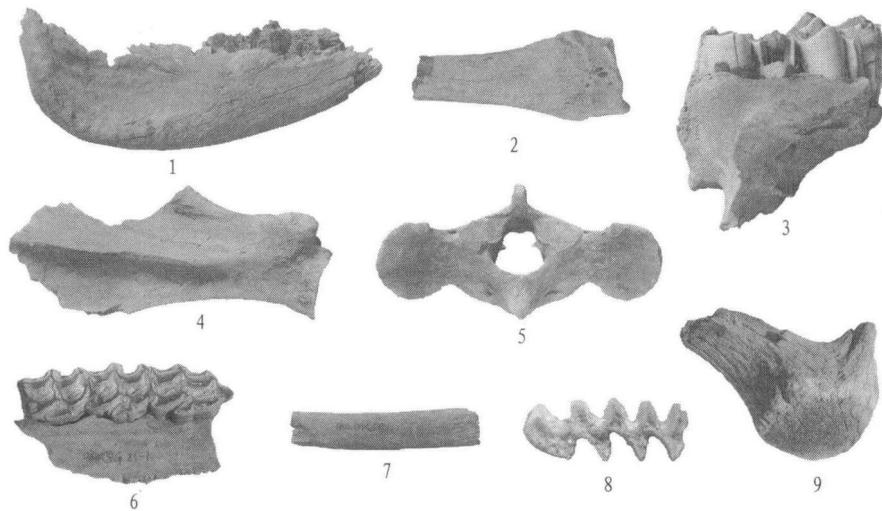
图六 石制品碎片  
(筛选自 11KW④b 层, 最大标本长约为 1 厘米)

为原地埋藏(图六)。

修整的工具以石片工具占绝对多数, 超过 99%。工具类型丰富, 据初步研究至少已有 12 类之多, 包括各类刮削器(凹刃、凸刃、直刃、凹凸刃等)、凹缺器、锯齿刃器、尖状器、端刮器、锥、钻具、鸟喙状器、带背刀、雕刻器、盘状器等。其中, 凹缺器和锯齿刃器是较典型的工具类型, 两者还可细分为富于变化的子类型。各式大小形态不一的尖状器以及锥、钻十分常见; 以石片为毛坯的带背刀特色突出; 鼻头状端刮器较为多见; 有一定数量的鸟喙状器, 偶见雕刻器; 盘状器独具特色。不少工具呈现出一器多用和多功能结合的特点。部分工具类型与欧洲传统旧石器时代中期以至于晚期的特定类型十分相似。从总体上看, 工具组合明显具有欧洲旧石器中期文化的特点。此外, 工具修理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 在加工工具时对毛坯中

的必要部位特别是相对称的部位给予特殊修整, 可能反映出工具制作中修柄意识与工具使用中装柄现象的流行, 折射出当时生活中对复合工具的强烈需求。修柄类工具多见于带尖类工具, 发现了比较原始的石簇。从工具类型在不同层分布的情况来看, 总体来说各类型的分布较为均匀, 即每一类在每一层中都有分布, 且百分比相差不大, 具体结论仍有待下一步的发掘材料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2. 动物化石与骨制品 第 1 点出土动物化石 3423 件, 还有大量筛选出来的碎骨。经初步鉴定, 有大、小哺乳动物和鸟类、软体类动物(图七; 图八)。其中大哺乳动物有披毛犀 (*Coelodonta antiquitatis*)、普氏野马(相似种, *Equus cf. E. przewalskii*)、诺氏巨驼 (*Camelus knoblochi*)、河套大角鹿 (*Megalocerus ordosianus*)、马鹿(相似



图七 出土动物化石

1. 披毛犀下牙床(KOW 10GC247) 2. 披毛犀烧骨远端(OKW ⑥4-1) 3. 莫氏巨驼(相似种)右上颌骨残段(OKW ⑧6-1) 4. 披毛犀肩胛骨(OKW ④50-1) 5. 披毛犀寰椎(OKW ⑧6-1) 6. 普氏野马(相似种)右上颌骨残段(OKW ⑤G21-1) 7. 鹿的肋骨残段(OKW 10GC50) 8. 齿白齿(未定种, OKW 10GC241, 长度小于4毫米) 9. 河套大角鹿角基(KW11⑥a547)

种, *Cervus cf. C. elaphus*) 和原始牛?(*Bos primigenius*) ; 小哺乳动物有麝(未定种, *Arvicola* sp.)、鼢鼠(*Myospalax* sp.)、仓鼠(*Cricetulus* sp.)、田鼠(*Microtus* sp.)、姬鼠(*Apodemus* sp.)和跳鼠科(*Dipo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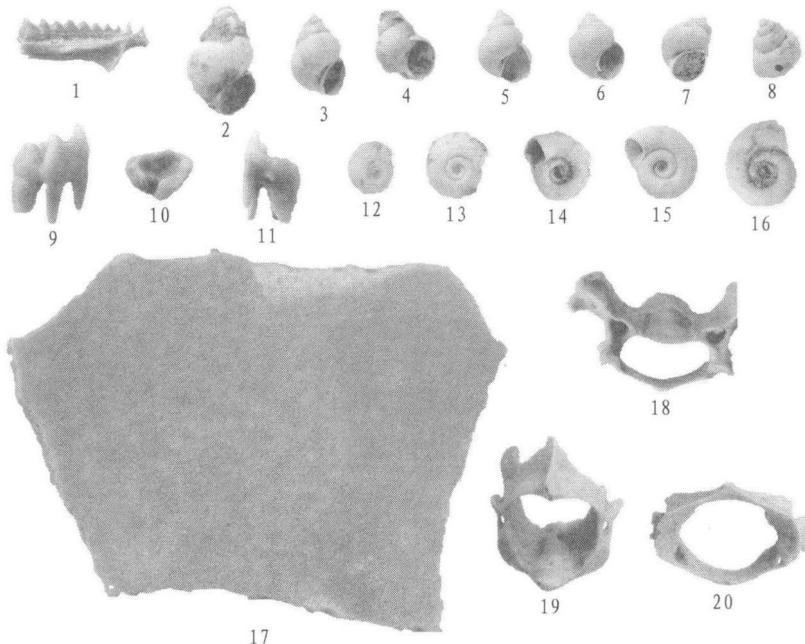
*dae gen. et sp. indet.*)。

从出土动物化石数量上看, 乌兰木伦动物群中以披毛犀数量最多, 其次是野马和河套大角鹿, 仓鼠、诺氏巨驼和牛较少。从动物牙齿标本反映的年龄结构来看, 披毛犀幼年

和少年个体相对较多, 野马基本上是成年个体, 其他种类由于个体数量较少难以判断年龄结构, 但总的来看主要是成年个体。从动物群的组成来看, 乌兰木伦动物群明显属于华北晚更新世萨拉乌苏动物群<sup>[7]</sup>, 即河套大角鹿—野马动物群<sup>[8]</sup>。

动物化石相当破碎, 常见牙齿、上下颌骨、肩胛骨、脊椎骨、上下肢骨、肋骨等。一些解剖学部

· 9(总 585) ·



图八 出土细小动物遗存

1. 小动物颌骨(11KW ④b) 2~8, 12~16. 螺化石(11KW ⑥B11) 9~11. 小动物牙齿(11KW ⑥A12) 17. 鸵鸟蛋壳(11KWCES1) 18~20. 小动物椎骨(11KW ④a)

位残留明显的石器切割痕迹，在鉴定为人工痕迹的骨化石中相对最多，可视为当时人类肉食的证据。此外，还有明显的打击骨片的证据。骨制工具也有发现，且具有一定的类型，目前已观察到有刮削器、尖状器和刀（图九）。具有人工痕迹的动物化石比例约为10%，烧骨在其中所占比例最少，它与用火遗迹一起共同反映出人类的熟食行为。骨制品的发现为遗址增添了更多的人类活动信息，加之与石制品共生，说明遗址所出化石与人类行为具有密切联系。可以预见华北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及人类行为比我们以往所了解的要深刻和丰富得多。

**3. 其他** 第1地点的第2、5、6层发现多处用火遗迹，由灰烬、木炭、烧骨和石器等组成。用火遗迹的发现表明遗址原地埋藏的性质，也为探讨乌兰木伦遗址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珍贵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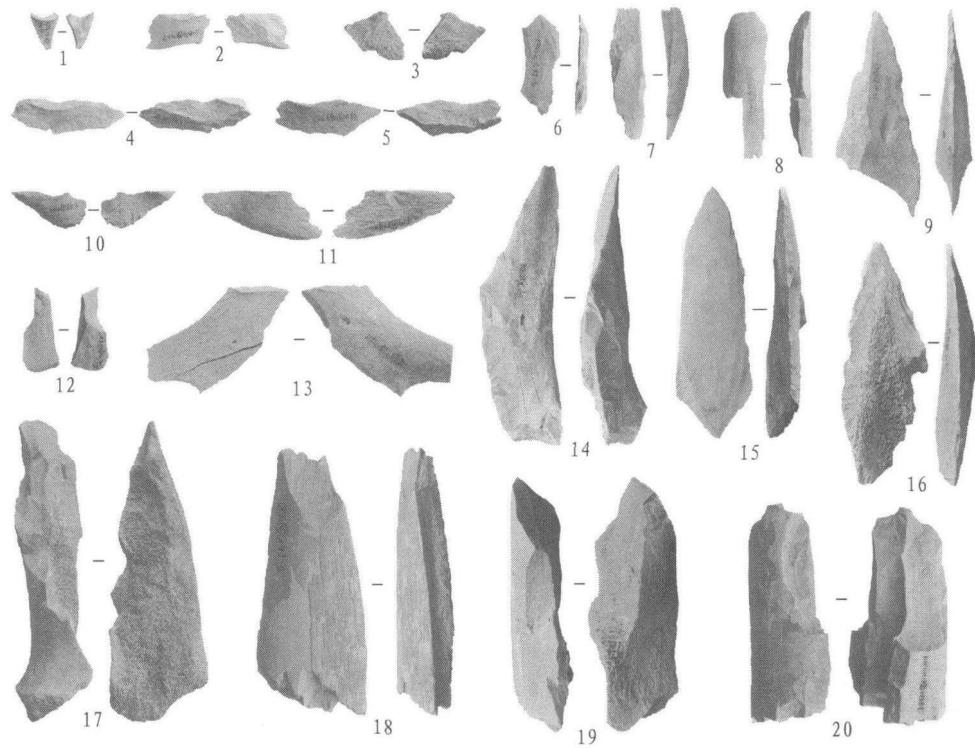
在第6和第7层还分别发现有一层薄薄的炭屑。所保存的炭屑颗粒，原树枝形状仍依稀可辨。目前，有关这两层炭屑的成因、性质和功能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 （二）第2地点

在第2地点试掘宽1米的探沟，其地层、年代、环境和遗址性质以及与第1地点的关系等研究尚在进行中。

试掘中获得石制品78件，动物化石仅2件。石制品原料皆为石英岩，类型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等。剥片和修理技术采用的是锤击法。初步看来，第2地点的石制品分布不如第1地点密集，动物化石数量也较少，具体原因是由于第2地点发掘区域的限制还是地点功能性质的不同，需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第2地点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揭露了一处疑似动物脚印遗迹。遗迹发现于该地点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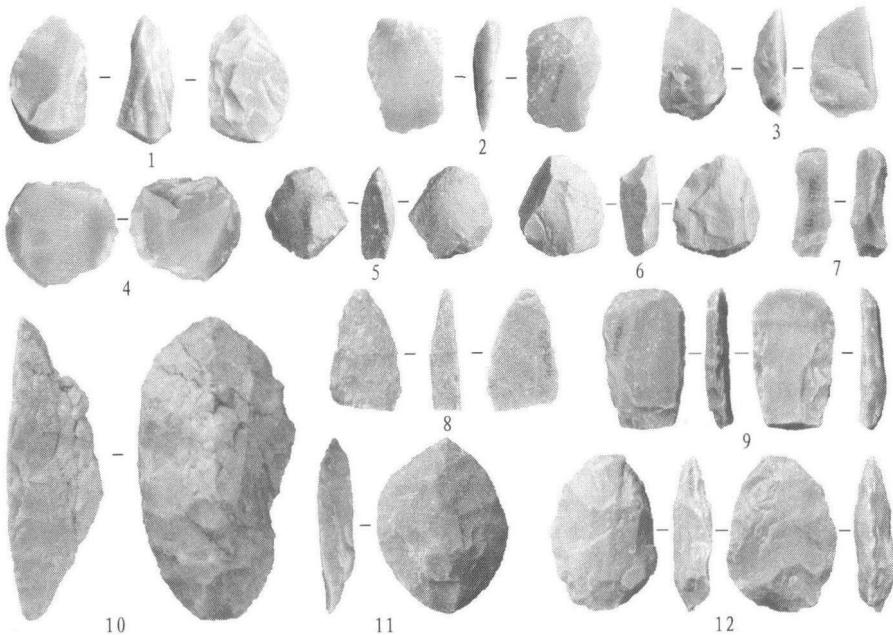


图九 出土骨制品

1~5、10~13. 骨片 (OKW④G23-1、OKW⑥G45-1、OKW④G28-1、OKW③G37-1、OKW③G37-2、OKW⑤G83-3、OKW④G18-2、OKW⑤G79-5、11KW②C132) 6~9、14~16. 骨器 (OKW⑤G48-3、OKW⑤G36-2、OKW⑥G10-1、OKW⑤G87-10、OKW10GC102、OKW10⑤G37-11、OKW④G37-1) 17~20. 带剥片疤骨化石 (OKW⑤G18-1、OKW④G42-8、OKWg63-1、11KWH13②1289)

· 10(总 586) ·

考古



图一〇 第10调查点石制品

1~3. 直刃刮削器(11WI10-C24、11WI10-C278、11WI10-C238) 4~6. 凸刃刮削器(11WI10-C203、11WI10-C177、11WI10-C122) 7. 石叶(11WI10-C149) 8. 尖状器(11WI10-C172) 9. 端刮器(11WI10-C187) 10、12. 聚汇式刮削器(11WI10-C5、11WI10-C197) 11. 莫斯特尖状器(11WI10-C157)

化层上部的细砂层中，近圆形，呈青灰色淤泥印记。在该遗迹的西北方向的探沟壁上还发现有两处，大小与平面上的完整印记相同。通过与现生犀牛的足部特点对比，遗迹形状与后者形态相符；而乌兰木伦遗址第1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中又以披毛犀数量为最多。当然，目前发掘面积相当有限，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这类特殊遗存现象应继续给予特别关注。

### (三) 流域调查

发掘期间联合考古队还对乌兰木伦河全流域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了众多旧石器地点，获取了十分丰富的旧石器遗物材料(图一〇)。两岸富集的旧石器遗址群落说明乌兰木伦河流域是乌兰木伦古人类生存、繁衍、打猎和打制石器的基本区域，表明乌兰木伦古人类是一个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阔的族群。

## 三、结语

乌兰木伦遗址是继1922年法国人发现

萨拉乌苏及水洞沟遗址<sup>[9]</sup>后，鄂尔多斯高原的又一次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sup>[10]</sup>。2010年至2011年对乌兰木伦遗址的发掘收获巨大。遗址发现、发掘和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地质时代、古环境背景、文化面貌、人类行为方式等方面。

1. 地质时代。根据遗址第1地点的地层和已出土的动物化石及石器所代表的年代范围，选择使用放射性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方法测定其年代。碳十四样品共采集了8个；沉积物OSL样品共22个，其中第1层之上的晚期河湖相堆积物8个，文化层14个。初步测年结果显示，遗址的年代为距今7~3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sup>[11]</sup>在我国较少发现，使乌兰木伦遗址的年代位置更加重要。加之遗址本身具备保存完好的埋藏堆积和丰富的遗物，显示出该遗址独特的研究价值。

2. 气候环境背景。初步研究表明本遗址深受东亚冬夏季风的影响，气候旋回明显，夏季风来临时水草丰美，气候湿润区域

随之向北扩大,适合生命活动。软体动物化石所在层位代表了温暖湿润型的气候阶段,属于萨拉乌苏动物群的大型食草类动物化石和众多小型啮齿类动物化石肢骨、牙齿的发现说明这一带当时正是这类动物生活的活跃期。遗址第1地点出土的3400多件古动物化石所代表的动物群带有明显的草原特点,这些动物生活于晚冰期中相对较暖的时段。该时段也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

3. 文化面貌较为独特,内涵丰富。除常见的各类刮削器之外,以发达的锯齿刃工具和凹缺器为代表的石器工业组合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面貌<sup>[12]</sup>趋同,预示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存在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石制品类型多样,既有对以往文化的继承,又具备诸多创新因素。除常见的器型外,一些新兴工具类型如修柄工具的出现反映出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引发的新需求。工具形态与生活方式相应,集中反映出“乌兰木伦人”为满足狩猎行为在生活中所需的不同器物类型,表现出石制品生产趋向专业化。

4. 人类行为方式。遗址中存在的大量碎骨和具有明显切割痕迹以及人工打片痕迹的骨化石与骨制品,表明遗址所出化石与人类行为有密切关系,反映了生活于末次冰期阶段的古人类在环境变化背景中采取的不同于以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骨器的制作是这一变化的突出标志。用火遗迹与烧骨现象的发现,可能说明“乌兰木伦人”具有加工熟食的习惯。由此可见,华北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面貌和人类行为比我们以往所了解的要更加深刻和丰富,乌兰木伦遗址也将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和行为发展的研究提供更加重要的信息。

总之,乌兰木伦遗址为研究晚更新世华北古人群生活方式转变与环境背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该遗址地处东亚北部人类迁徙的腹地,代表晚更新世萨拉乌苏组,在

气候变化上属于最末次冰期全球气候变化显著的阶段。生存环境的改变使人类面临挑战,本遗址即反映了该阶段人类适应行为反应的特点。该阶段同时也是现代人起源的敏感时段,乌兰木伦遗址地处华北腹地以北、连接东亚大陆与东北亚的走廊地带,其发现和研究为现代人起源的研究<sup>[13]</sup>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初步发掘成果表明,该遗址的深入研究将对鄂尔多斯高原的第四纪地质学、古环境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等相关学科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并将对东亚史前史和第四纪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附记:遗址的发掘得到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鄂尔多斯市政府和市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并得到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批准号为XDA05130203)、鄂尔多斯市政府专项经费、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化石发掘与修理专项经费和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项目(批准号为2007FY110200)的共同资助。袁俊杰、刘光彩、董为拍摄并编排了部分照片。笔者对上述单位和个人一并谨致谢忱。

## 注 释

- [1] a. 陕西省地质矿产局第二水文地质队:《黄河中游局域工程地质》,地质出版社,1986年。  
b. 李兴唐:《华北断块区前震旦纪断块的形成与断裂》,见《华北断块区的形成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0年。
- [2] 侯光才、张茂省等:《鄂尔多斯盆地地下水勘查研究》第27~60页,地质出版社,2008年。
- [3] 袁宝印:《萨拉乌苏组的沉积环境及地层划分问题》,《地质科学》1978年第3期。
- [4] a. 同[1]。  
b. 同[2]。
- [5] 刘东生、施雅风等:《以气候变化为标志的中国第四纪地层对比表》,《第四纪研究》2000年第20卷第2期。
- [6] 卫奇:《西侯度石制品之浅见》,《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19卷第2期。
- [7] 祁国琴:《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 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13卷第4期。
- [8] 黄万波:《中国晚更新世哺乳动物群》,见《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 [9] a. Boule M, Breuil H, Licent E et al. *Le Paleolithique de la Chine (Paleontologie)*. Archives de Institut de Paleontologie Hu-maine, Memoire 4. Paris, 1928. 1–136.  
b. Teilhard de Chardin P, Licent E. 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eolithic industry in Northern China.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4, 3(1): 45–50.
- [10] 王大方、侯亚梅、王志浩:《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遗址》,《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28日第6版。
- [11] a. 黄慰文、董光荣、侯亚梅:《鄂尔多斯智人的地层、年代和生态环境》,《人类学学报》2004年增刊。  
b. 黄慰文、侯亚梅:《萨拉乌苏遗址的新材料:范家沟湾1980年出土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22卷第4期。  
c.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
- 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d. 黄慰文、傅仁义:《小孤山——辽宁海城史前洞穴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e. 李占扬:《许昌灵井遗址2005年出土石制品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07年第26卷第2期。
- [12] F. Bordes, *The Old Stone Age*. London, 1968.
- [13] a. Wolpoff M H, Spuhler J N, Smith F H, et al. Modern Human Origins. *Science*, 1988, 241 (4867): 772–774.  
b. D W Frayer, M H Wolpoff, A G Thorne, et al. Theories of modern human origins: the paleontological te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3, 95(1): 14–50.  
c. 吴新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在中国的实证》,《第四纪研究》2006年第26卷第5期。  
d. Templeton Alan R. Haplotype Trees and Modern Human Origins. *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05, 48 (S41): 33–59.

(责任编辑 李学来)

## ○信息与交流

### 《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简介

《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由河南省文物局编著,科学出版社于2012年6月出版发行。该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419页,字数约78.5万字,文后附彩版108幅,黑白版30幅,定价280元。

2005年6~12月和2006年7月至2007年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鹤壁市文物工作队,对南水北调工程首批实施的控制性文物保护项目之一的鹤壁刘庄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揭露面积15150

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时代晚期大司空类型文化遗存和下七垣文化墓地。该书全面、系统地报道了下七垣文化墓地资料,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该报告为研究下七垣文化的墓葬制度、文化面貌与分期,以及先商文化的探索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该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雨 珺)



3. 第2地点探沟（西南→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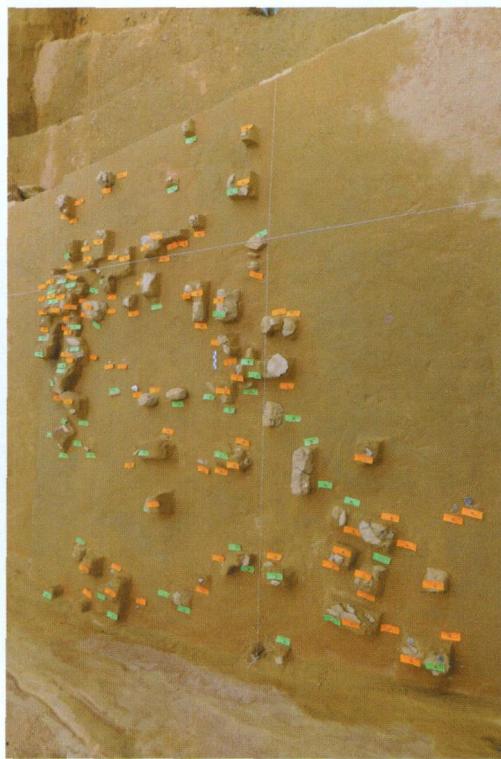


4. 第1地点发掘场景（南→北）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



1. 乌兰木伦遗址远景（西南→东北）



2. 第1地点遗物平面分布（西北→东南）

## 本期要览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 乌兰木伦遗址由邻近的第1、第2和第3地点组成。其中在第1地点获得了石制品2780件、动物化石3423件，并发现用火遗迹。遗址年代为距今7~3万年，属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为原地埋藏，其石制品类型及工业组合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近似，动物化石则属于华北晚更新世的萨拉乌苏动物群。

**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 2011年的发掘** 对哈民忙哈遗址进行的第二次发掘共清理出房址29座、灰坑10座、墓葬3座以及环壕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玉器等1000余件。此次发掘，发现了房屋木质结构痕迹，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并清理出史前时期的房顶梁架结构。房址内发现众多的人骨遗骸也是史前时期考古中所罕见。

**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 在叶家山西周墓地共发现墓葬65座和马坑1座。出土铜器、陶器、原始瓷器和玉器等遗物700余件套，其中部分铜器上有“曾”、“侯”、“曾侯”和“曾侯谏”等铭文。据器物形制和铜器铭文，该墓地是西周早期曾侯的家族墓地。这对研究汉东西周早期曾鄂、曾楚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 大云山汉墓区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陵园。陵园内共发现主墓3座、陪葬墓11座、车马陪葬坑2座、兵器陪葬坑2座以及陵园建筑设施等遗迹。其中，M1与M2出土了包括玉棺、金缕玉衣等在内的漆器、铜器、金银器、玉器等精美遗物。结合文献和出土资料，M1墓主人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

**山东定陶县灵圣湖汉墓** 灵圣湖汉墓(M2)整体呈“甲”字形，地上墓室为人工夯筑。墓圹近方形，四壁用木板贴护。木椁周围有大量积砂，顶部及周边用青砖封护。椁室为大型“黄肠题凑”建筑，由前、中、后三墓室和侧室、门道、回廊、外藏室、题凑墙组成。该墓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是研究汉代“黄肠题凑”葬制的珍贵资料。

**西藏定结县恰姆石窟** 恰姆石窟群共有三区105座洞窟。其中，IK1为单室造像窟，平面形状呈马蹄形，在西、北、南三壁发现泥塑和壁画。IK2为多室窟，窟内残存有泥塑和壁画。IK3为相邻的两座单室窟，仅见壁画。该石窟群的发现，对探讨西藏早期佛教艺术、佛教发展史，甚至后弘期初期西藏社会历史的进程具有重要价值。